

第一章 动荡的“红都”

一、危机肇始

1934年9月17日，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来自“红都”瑞金的绝密电报。电报发出人署名“波戈列洛夫”。电报有几百字，共产国际由此最终确认一个最不愿意得到的消息——“红都”即将失去！

共产国际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因为署名“波戈列洛夫”的人就是中共临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在电报中告诉共产国际：“中央（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期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①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撤离“红都”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共产国际在接到电报后，尽管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中国中部这块最大的根据地感到痛心，但并不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显然对中国共产党“声东击西”的转移策略不满意，对可能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进一步损失感到焦虑。

9月2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陈绍禹）和代表团成员康生专门回复秦邦宪来电，对撤离“红都”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对“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表示强烈的不理解和担心，要求中共临时中央作出解释。

王明和康生之所以不同意“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主要是认为进攻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军队会动摇与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关系，尽管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后已经被改编，但王明和康生认为这支部队依然可以利用。他们在电报中说：“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仇视我们。”^①

随后，“红都”局势急转直下，对于中央苏区的红军来说，“声东击西”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

10月14日，王明和康生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追问道：“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请立即告知。”^②

但电报发出后，中共临时中央却无回音。

10月15日，已经感到局势危急的王明和康生再次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急切地询问：“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请立即告知。”^③

中共临时中央依然杳无音信。

共产国际不会知道，王明当然也不会知道，就在5天前的夜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 000余人，已经开始从“红都”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这场战略大转移在约5个月后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首次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在1935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的名义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④这里则首次提出和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的说法。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说：中央红军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征”。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任务已经完成。这时的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初，他向红一军团随行部队发表讲话，开始对长征进行总结。11月中下旬，先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③ 同上书，第279页。

④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两个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一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并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

长征是中国革命面临绝境时的一次艰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些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被迅速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中、下旬，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刘少奇、黄平、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共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时称“临时中央”）成立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继续积极推行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认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①。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白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作者注）城市工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秋冬，中共山东省委、中共河南省委、中共武汉特委、中共长沙中心市委、中共两广工委及共青团中央机关等先后被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大为减少，使得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的地下斗争越来越困难。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就在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的时候，党领导的苏区（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作者注），特别是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中央苏区已拥有29个县、300多万人和5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至1932年秋），并且红军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还在进一步发展扩大。

中共临时中央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难以继续在上海立足的情况下，只好撤离上海。博古提出自己去江西中央苏区，派张闻天到北方局开展工作。可是张闻天也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两人意见出现分歧，只好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指示：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遂决定：派康生赴莫斯科协助王明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卢福坦、李竹声留守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代中央领导“白区”党的工作及完成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

这是一次遭遇严重挫折后的撤退，但中共临时中央不仅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还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带到了中央苏区，使得这一挫折最终演变成一场几乎断送革命前途的重大危机。

1933年1月17日，博古等人由上海出发，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和护送下，乘船绕道广东前往中央苏区。

1月18日，博古一行抵达广东汕头后与中央特科汕头交通站负责人陈彭年取得联系，在汕头停留一日后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火轮沿韩江北上，经茶阳换小船到达大埔的青溪。在这里，博古等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央苏区的人，他们是由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带领的武装交通队，负责护送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在卓雄率领的武装交通队的保护下，博古等人由大埔向北进入国民党控制的粤东北地区，历尽艰险，终于在1月下旬抵达上杭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

就在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就清楚地表达了对所谓“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错误路线”的不妥协，并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将革命形势一步一步推向危机的境地。

进入中央苏区后，博古一行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的欢迎，并由他们陪同一起前往瑞金。在去瑞金的途中，经过长汀时，罗明提议大家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同行的陈云等表示同意，但是博古明确表示反对，最终未能成行。

博古的态度并不出人意料。实际上，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早已开始，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长汀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受到系统的、持续的批判而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层，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的。

如果把中央苏区从最初的辉煌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陷落看成一个完成过程的话，这个成败转换的关键就是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和随后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的压制和打击。

对毛泽东的直接批判开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①曾派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苏区工作，王明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听取中央苏区工作情况汇报后，于8月3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虽肯定了中央苏区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批评中央苏区犯有“最严重的错误”。

“8月指示”发出后不久，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由王明主持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估计，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②，形成了“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③，为此，决议案要求中央苏区“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④，“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⑤决议案特别强调：“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⑥很显然，这个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就是针对毛泽东本人。

为了让中央苏区“尽快”纠正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再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认为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二是规定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三是“发展苏

①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③ 同上书，第405～406页。

④ 同上书，第409页。

⑤ 同上书，第411页、第410页。

⑥ 同上书，第414页。

区内部阶级斗争”，“加紧反对各种派别的思想斗争”，“征服自己阶级内错误思想”。^①电报明确要求，中央苏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31年11月1—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虽在原则上肯定了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重点却是贯彻和执行了“国际路线”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思想理论上，会议把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斥责为“狭隘经验论”。会议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指责：“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②

在土地分配上，会议无视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中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和在开辟根据地实践斗争中形成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指责苏区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③。

在红军问题上，会议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④；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⑤；认为“在改造红军的成分上不以肃清地主富农商人等分子为中心”，也是“模糊了阶级路线”的表现；指责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⑥对红军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也都加以否定。

在根据地问题上，会议批判苏区犯了右倾保守错误，不顾客观事实，指

①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四号电——苏区工作的成就、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1931年10月），转引自《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③ 同上书，第44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478页。

⑥ 同上书，第453页。

责“中央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①，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②

在党的建设上，会议指责苏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③。“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到异常的程度。党内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手中，甚至还有地主富农分子暗藏在党内指导机关以内”，“很少注意工人运动的领导”，^④导致“党内反革命派别活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⑤。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所谓路线错误批判得很不够。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会议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电文说道：“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⑥7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再次发出《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的指示。这封指示长信对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所谓“政治错误”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批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战略上“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而过分的估计敌人内部的冲突，似乎是乐观的否认敌人新的进攻的危险，而从这里产生防守的，休养生息，准备在遥远的将来去抵御敌人的进攻。实际上便产生了当时的所谓集中训练红军二月的计划，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与攻打土围子唯一的任务”^⑦。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工作检查，是再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要有切实的转变，抛弃这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② 同上书，第459页。

③ 同上书，第465页。

④ 同上书，第466页。

⑤ 同上书，第468页。

⑥ 同上书，第220～221页。

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种旧的官僚主义的方式，而采取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①

一份又一份的电报和指示，不断加剧了中央苏区内部的争论和分歧，严重影响了正在部署中的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展。

为了尽快解决与后方中央局领导人在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分歧，统一对红军行动部署问题的认识，在反“围剿”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以大局为重，多次联名恳切提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以解决分歧，达到统一认识。然而，他们的提议均未被采纳。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敌人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为《训令》）。《训令》分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策略，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粉碎敌人进攻的军事方针，规定了红军当前的战略任务，预定了即将决战的战场，对部队作战区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训令》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历次军事斗争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训令》不仅在指导上，而且在战役部署上都与中共临时中央的精神相违背，因而遭到留守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些重要成员的反对。

9月29日到10月1日，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连续三次给前方指挥机关发电报，指责《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②责令前方停止执行，并随即同意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会议。

10月3—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也称宁都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但《苏区中央局宁都会会议经过简报》指出，这次会议开展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③。

会议对1932年“二月后几次战役的估计”做了错误的评析。参加会议的部分成员无视赣州战役失败的事实，错误地坚持认为攻打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需要的。而对毛泽东建议攻打漳州并取得胜利的漳州大捷却指责为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会议还批评毛泽东在指挥南雄战役中犯了“分兵错误”，宜乐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对此，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在撤围赣州后，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新的苏区的行动是正确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然而，会议对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却视为“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的表现，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①。

会议传达了中共临时中央9月30日发出的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方针，虽然“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但在讨论和制定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具体方针时，毛泽东却坚持认定红一方面军《训令》是正确的，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却指责这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因此，“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的行为。^②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因此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③

会后，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周恩来——作者注）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其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顾及泽东在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② 同上书，第530页。

③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①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共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迫使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打击了毛泽东，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非常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和建议。他后来回忆说：“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上杭）、永（永定）、岩（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②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主张和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福建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上杭、永定、龙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二、中央苏区内的整肃

罗明就是在上杭、永定、龙岩开展工作期间接到迎接博古一行任务的，并一路相送去瑞金。让罗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博古的这“一路之缘”，却让他成为一场苏区“政治大风暴”的“暴风眼”。

其实，这场风暴也不是没有预兆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页。

② 罗明：《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根据罗明后来的回忆，在陪同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去瑞金的路上，他就受到了指责，以致许多次谈话都不欢而散。在途经上杭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就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接着，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又问他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罗明说没有听到传达。随后被问到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罗明还没说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①对此，罗明及一些陪同人员都感到不理解，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对罗明等人却已经非常“理解”了，只是没有到发作的时候而已。

1933年1月中下旬，正值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阶段，刚迁到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及其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为推行所谓的“进攻路线”，接连发出“猛烈扩大红军”的指令，硬性规定闽西苏区除动员地方武装整团整营补充主力红军外，还要进行扩红突击运动，要求动员3000名新兵加入红军，其中分配上杭、永定、龙岩苏区扩大红军1500人的任务，需限时送到主力军部队中。罗明认为，中央的上述指示不切合边区斗争的实际情况，在敌我斗争激烈、战争形成拉锯状态的边区，应采取不同于巩固的红色中心区的斗争策略和领导方法。因此，他于1月21日向闽粤赣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报告就党的主要工作、红军发展的方向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并公开指出了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的不足和问题。报告强调，党目前在龙岩、永定、上杭各县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的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通过不断地取得胜利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因此，要克服群众中“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报告认为，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与当地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以找到各县、区特殊的任务。过去党和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都是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报告特别针对中共临时中央要求“扩红”的指示，提出边区各县同中心

^① 罗明：《关于反对“罗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81年第7期。

区域的扩大红军工作应有所区别，机械地规定边区要扩充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特别是硬将地方武装整团、整营、整连地连人带枪补充主力红军的做法，更是脱离边区斗争的实际，扩大中央主力红军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边区的永定、上杭、武平等县，则首先应抓紧扩大地方红军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然后再从地方武装中分期分批地抽调人员去充实中央主力红军。“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永定上、下溪南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300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如果这样来领导当地工作，又会进步，又更好，会出更多红军。”^①

在发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后，罗明认为该意见中的一些问题仍然没有说透彻，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强调和说明，于是，1月底，他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认为，目前“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至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要是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地方武装和红军力量，来提高群众对斗争的认识与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罗明在报告中接着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决目前的许多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来坚决转变，如果只注意到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是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指项英——作者注）、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此外，罗明在报告中认为，上杭、永定、龙岩边区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该地区的土地税款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定比例给地方作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的生活便无法维持。^②

就在罗明给省委写报告前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闽粤赣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新泉县的情况向省委提出建议说：“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

①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68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10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听到确实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或合并，新泉是战区，县级机关庞大，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应该适当合并，求得机关精干，领导集中。”“过去一切的计划是党代替了政权机关（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对于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的及地方武装工作应由政府计划，党只能推动这一计划的完成与加强政府的领导，提高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的研究；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①

罗明和杨文仲的报告及来信，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却认为，这些报告和来信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意见的范围，是路线错误的集中体现。

2月15日，博古等首先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出闽粤赣省委“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主观武断地认为：“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该决定还指责闽粤赣省委“表示了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就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斗争的不坚决，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决定要求改组省委，“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的顺利进行。”“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②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7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三）》第9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5页。

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该决议“完全同意党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严厉指责罗明“反国际反中央反党”，批评闽粤赣团省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认为他“缺乏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彻底性和顽强性，没有能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于是改组了团省委，并提出不仅在闽粤赣省全省，同时要“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①

在苏区中央局的高压下，以陈寿昌为领导的闽粤赣省委临时常委于2月24日作出了《临时省委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该决议“责成各级党部立刻召集各种会议讨论中央局的决定，并深刻的揭发罗明路线与对于这一路线的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而且这一讨论一定要深入每一个支部与小组中去……发动全党同志与之斗争”。^②

2月16日，在博古亲自出席参加的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学生中全体党员、团员及连一级以上干部的党员、团员大会上，又作出决议，“建议中央局立即停止罗明及杨文仲同志党的负责工作而在组织上给以相当的制裁”。博古在大会上专门做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该报告对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和“实质”进行无限上纲上线的“揭露”和“批判”，为在全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定下了基调。

罗明被撤职并被调回汀州时，苏区中央局即通知他马上到瑞金做检查。罗明在瑞金做检查期间，博古等人先后找他谈话，要求他彻底检查“路线错误”。罗明对此据理力争，并用事实说明自己到边区前线是领导开展游击战争，怎能说是犯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呢？！罗明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加以反驳。对此，博古却武断地说：你不承认犯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红军，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博古要罗明回汀州，在即将召开的闽粤赣省党代表会上做检查。

在苏区中央局代表的直接领导下，2月28日，闽粤赣省党的临时代表会议在汀州召开，罗明等人在会上受到猛烈批判，被连续批斗了三天三夜。会议召开期间及会后，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接连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并在各种场合做了有关讲话，迅速在整个中

①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② 同上。

央苏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的高潮。一大批对“左”倾错误方针表示怀疑或不赞成、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党、政、军和团的领导干部，被任意点名批判以致被撤职或调动。

在罗明被撤职以后，闽粤赣省委、团省委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其所属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由于对反“罗明路线”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因而被“左”倾领导者指斥为“不能站在党的进攻路线上坚决反对罗明路线”“对罗明路线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态度”，等等。省委代理书记刘晓和省委军事部长游端轩、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明光、团省委书记陈荣，还有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永定县委的罗禄山、汀东县委的陈玉珍等，都先后受到批判并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郭滴人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和撤职后，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当文化教员。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因不同意反“罗明路线”，并极力保护被“左”倾领导者打击的各级干部，而被扣上“一贯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与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大帽子，且被撤销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闽粤赣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公开申明赞成罗明的意见，拒绝检查犯所谓“罗明路线”错误。因此，“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和谩骂谭震林“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等等。在1933年6月召开的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和福建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谭震林及其同情支持者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批判，并被撤销省军区的一切职务。

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之下，几乎没有一个区级或连级以上的干部不被卷入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漩涡之中；往往是打击一个提拔一个，闽粤赣省委、团省委和福建省军区、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下属的各级机关干部，自反“罗明路线”斗争起至中央主力红军转移长征止，不断被撤换或调动。经过反“罗明路线”斗争，闽粤赣苏区大批的老干部受到批判以致被撤换了。

接着，中共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等。因此他们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接着，又把萧

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

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实质上是针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拥护其主张的广大干部。博古在同罗明谈话时曾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于罗明给省委的报告中称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并把毛泽东和斯大林并列，博古公开责问罗明：“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①

十几年后，博古在党的七大上检讨自己错误的时候曾说道：“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②

反“罗明路线”斗争，从1933年2月开始，一直进行到红一方面军被迫转移长征时才停止下来。这场错误的、长时间的党内斗争，使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抵制“左”倾错误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打击，对于后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逐步被侵蚀的基础

尽管反“错误路线”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是，对于中共临时中央来说，真正该做的头等大事，是迅速建立起合法有效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眼里，中央苏区几乎泛滥着“错误路线”，从反面也说明尽快建立一个能够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极其重要性。

于是，就在反“错误路线”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局成立了。

1933年1月底，在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召集下，到达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原在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瑞金沙洲坝的下霄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局。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陈云、刘少奇、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因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未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一直在长汀养病，也未能参加会议。

会上，由博古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

^①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见：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并要选举一位负责人以便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博古为总负责人。”^①这个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局。

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继续担任中央局常务委员，张闻天兼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和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陈云兼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任弼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1933年5月后由李维汉接任），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严重（严仲）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东、周恩来、项英、朱德、王稼祥、邓发、顾作霖等仍分别任原职。中共中央局与少共中央局机关驻瑞金沙洲坝下雷村杨氏私宅，全总中央执行局驻沙洲坝枣子排村。

1933年1月3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一次常会，议决：“与中共中央局及全总中央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通知各地选送学员入校。这是新的中央局成立后首次正式使用“中共中央局”称谓。

中共中央局对内仍称中共临时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只能对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实施领导。全国其他苏区，主要是由当地中央分局或中央代表领导。白区党组织则由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中共中央有些对白区工作的文件也由中共上海中央局代为拟定并发出，发文时用中共中央名义。新的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宣布撤销，有时行文仍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但从此以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中共临时中央也清楚地知道，对于苏区来说，头等大事还是反“围剿”，巩固红色政权。开展路线斗争，是服务这个头等大事的重要举措，但这仅仅解决了方向和路线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组织千军万马的革命队伍，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广泛地组织动员和发动，更加充分地调动苏区群众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

新的中央组织机构一成立，立刻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从1933年2月开始试点，6月正式开始，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主要在中央苏区开展。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早在1931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布过《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